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通讯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19年5月刊·第5期（总第32期）

本期要目

■ 思想前沿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 “大系”平台

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第六次协调会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召开

谜语的学术理念与文化实践

■ 学术视野

民间文化遗产资源转换的亚洲经验

“说唱”概念的历史沿革及学术定位

■ 文化实践

闯关东文化溯源——再探东北地区民间文化的智慧源泉

目 录

■ 思想前沿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1

■ “大系”平台

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第六次协调会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召开.....3

谜语的学术理念与文化实践.....5

· 各地推进动态 ·

四川省民协召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2019年编纂工作会.....20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安徽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在安庆召开..21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湖北省示范卷编纂工作座谈会在武汉举行..23

■ 学术视野

民间文化遗产资源转换的亚洲经验（潘鲁生）.....24

· 论文推介 ·

“说唱”概念的历史沿革及学术定位——兼论其与“曲艺”及“说唱艺术”之关系（郝冬萍）.....27

■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闯关东文化溯源——再探东北地区民间文化的智慧源泉.....42

主 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 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理论研究处

主 编

潘鲁生 邱运华

编辑部主任

王锦强

编辑人员

覃 奕 张礼敏

张慧霖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号院32号楼B307

投稿邮箱

mjwydt2016@163.com

电 话

010-59759244

010-59759490

本期印刷：2019年6月

花馍艺术国庆献礼.....	45
系列玉雕创作紧扣国庆主题.....	47
“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考察文献”三十年后重汇集.....	49
四川省民协与川师美院共商“集成”大计.....	50
旗袍文化沈阳故宫留魅影.....	51
《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立说铸魂.....	52

· 国际信息 ·

“中国史诗传统展”首秀哈萨克斯坦.....	53
中国技艺闪耀伦敦手工艺周.....	54
欧洲遗产保护注入新生力量.....	55

思想前沿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是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近3200公里，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勇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但长期以来，大运河也面临着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占严重、合作机制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和困难。出台《规划纲要》，强化顶层设计，推进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对于打造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都具有积极意义。

《规划纲要》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化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科学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

《规划纲要》明确，要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构建一条

主轴带动整体发展、五大片区重塑大运河实体、六大高地凸显文化引领、多点联动形成发展合力的空间格局框架，并根据大运河文化影响力，以大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为基础，统筹考虑遗产资源分布，合理划分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清晰构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空间布局和规划分区。

《规划纲要》以专门章节突出强调，要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弘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从这3个层次深入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突出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以此统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规划纲要》从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河道水系治理管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创新保护传承利用机制等6个方面着手，分6个章节阐述各方面重点工作、重点任务和重要措施，并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河道水系资源条件改善、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文化旅游融合提升4项工程，以及精品线路和统一品牌、运河文化高地繁荣兴盛2项行动。

为保障各项工作的推进实施，《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调动各方力量，健全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把工作抓实抓好。要强化组织实施，建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协调机制，负责统一指导和统筹协调《规划纲要》实施，大运河沿线8省（市）是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主体，各县（市、区）承担各项任务落实的直接责任，中央各相关部门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

《规划纲要》还从完善政策措施、健全法律保障、抓好督促评估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明确了重点任务的部门分工，以保障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新华网 2019 年 5 月 9 日）

“大系”平台

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 2019 年第六次协调会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召开

2017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作为其中的十五大工程之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的编纂工作于 2018 年正式启动。该工程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中国民协具体实施。按照“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的部署，首批 12 个门类示范卷预计今年国庆前夕面世，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

2019 年 5 月 12 日，“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第六次协调会（专家组长、分卷主编、责任编辑联席会）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召开。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建文，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潘鲁生，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邱运华，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庆，中国民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大系”故事专家组组长万建中，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大系”说唱专家组组长苑利，中国民协副秘书长（挂职）、“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温州大学教授黄涛，中国民协理论研究处处长、“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锦强，中国出版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大系出版工程”设计总监刘晓翔，以及“大系出版工程”12 个门类的编辑专家组负责人、相关卷本的主编及责任编辑近 60 人出席会议。

潘鲁生主持了上午的会议，他发言中表示，此次会议力求通过专家组长、分卷主编、责任编辑联席会，建立三方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渠道，高效解决编纂和编辑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形成《大系》工作的良好机制。他强调，“大系出版工程”应秉持“继承

与创新、内容与形式”并重的原则，针对文本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重申编辑体例的重要性，要区分共性和个性问题，针对装帧设计要精益求精、庄重大方，兼顾国际化与民间化的设计框架。邱运华在会上汇报了2018年首批示范卷编纂进展情况，并强调完成时间节点的重要性。黄涛从“吸纳前人成果与学术创新的关系”、“吸纳前人成果与编选撰写的关系”、“民间与非民间、民俗的与非民俗的区分”、“体裁分类”、“相关要素标注”、“敏感问题的处理”、“学术见解的正确、严谨”、“学术规范”、“体例、文字与格式”、“知识产权”、“其他问题”等11个方面详实地汇报了专家在审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结合江苏俗语卷的词条释义、河南故事卷的编纂流程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陈建文在发言中向参与此项工程的各位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集中精力，保质保量地完成第一批12卷成果，加大宣传力度。二、形成合力，妥善解决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严格把握好“思想性、学术性、创新性、合法性”这四性要求。三、树立典范，积极发扬工匠精神与奉献精神，克服困难，共同做好“大系出版工程”，为今后民间文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文联出版社《大系》出版工作委员会学术总监、故事·河南卷责任编辑王素珍作为出版社编辑代表汇报了各卷本文稿的现状与编辑团队各位同志的心得。她从概述和凡例、分类与排序、注释、附记和附录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辑加工中的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刘晓翔从版面尺寸、字体使用、色彩识别系统、符号提示系统、体裁版式、装帧用料等方面汇报了装帧设计方案和整体设计思路，并表示将汇集各方意见不断地调整与完善。朱庆在发言中表示，这项国家精品工程落在中国文联出版社身上，既是荣耀也是责任与担当，中国文联出版社必举全社之力做好“大系出版工程”。

下午，专家组长、分卷主编及责任编辑按体裁分成四个小组进行讨论，具体对接解决各卷本编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现场气氛热烈，交流、讨论充分，问题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会议取得良好的效果。

此次会议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有效地建立了专家、编委、责编、装帧设计团队等多方合力沟通与协调的渠道，进一步探索、完善了《大系》的工作机制，为今后“大系出版工程”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开展提供了经验和保障。

（张慧霖）

谜语的学术理念与文化实践

编者按：“大系出版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汇集口头文本、身体文本、视觉文本和仪式文本的全景式的记录优势和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叙事策略，为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奉献当代学人智慧与人文理念。梳理和辨析各类别民间文学的学术界定，审度和阐释分类与编纂原则，研究和把握编纂体例及作品选材标准，总结和交流地方实践经验与调研成果，既出于推动各地编纂工作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工作的重要环节。为此，中国民协与《文艺报》合作，将陆续刊发相关的专版文章。以下部分文章刊发于《文艺报》（2019年5月22日第7版），由于版面有限，报纸登载的是删减版，现将谜语组专家及地方卷编纂工作负责人的五篇文章呈录如下，供参考交流。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的编纂原则和体例解读

萧放 高忠严¹

民间谜语是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微型作品，最能体现民众语言的智慧。它是用比喻、谐音、象形、寓意等多种手法，来映射和暗示事物本来面目的一种民间文学体裁。同时它又是一种利用谜面的语言描述引发猜谜者的联想，从而推测出所指之事、物或文字的语言游戏形式。谜语可以启迪民众智慧、训练人们的思维能力，也可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开阔人们的眼界。透过谜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方社会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及民众的审美情趣等。

谜语根植于人民生活之中，是民众审美情趣和智慧的表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弘扬谜语文化，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谜语是中国民间社会认知世界的百科全书，它涵盖风雨雷电、山川湖海、鸟兽虫鱼等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同时它与民族心智和审美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库。

¹萧放，“大系”谜语专家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教授。高忠严，“大系”谜语专家组专家，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谜语在民间文学领域，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对民间谜语未能给予关注，大量的民间谜语依然散落在民间。当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的搜集整理是全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可循。对谜语来说，此项工程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抢救工程，它推进了此前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忽视的谜语部分。

2018年“大系出版工程”将河南、湖北、京津冀作为三个示范卷，推进谜语卷的编纂出版工作。其中河南民协率先示范，积极动员，先后开会十余次，充分发动省内各级民协会员，参与到此项工作中。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人员动员、组织建设、谜语征集和整理汇编，终于完成了河南卷的编纂工作。我们在专家讨论和河南卷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在编纂方面遵循的科学性、全面性、地域性和代表性的原则。

一、科学性

指搜集、整理、翻译民间谜语过程中的忠实性和准确性。要忠实保持口传文学的特点、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同时也要准确地翻译民族语言、地方方言。

二、全面性

谜语卷本所收录作品应基本包括全国56个民族的各类谜语。在内容上注重其传统性和时代性，历史上广泛流传的要收集，新时代以来出现的新作品同样要收集，口头流传的要搜集，记录于书的也要搜集。“大系出版工程”的实施，目的是萃取经典，服务当代。实际上，除了灯谜外，大量的民间谜语尚未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即使地方谜语研究者和搜集者也很少把民间谜语纳入其视野，有关民间谜语专著保留下来的十分稀少。这就要求工作人员既要搜集口传的谜语，也要下功夫搜集整理已有文献。以河南为例，文献资料主要有民国时期白启明搜集整理的《河南谜语》，上世纪八十年代民间歌谣集成搜集过程中保存的资料以及部分地区对民间谜语也有少量的整理印刷的谜刊和油印小册子，这些材料都弥足珍贵。

三、地域性

地域性指在搜集整理过程中，要保留谜语的语言特色、内容特色和形式特色。谜语中的方言土语要尽量保留，不易看明白的地方用注释标明。所收的作品要尽量标明讲述者、

整理者，以及其流传地区、搜集时间等。记录文本应尽可能接近当地的口头传统。各地谜语都是地方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民俗风物、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的反映，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征。在整理河南谜语中发现其农耕文化特色鲜明、女娲文化意蕴深厚、民间字谜数量超出想象、连环谜和歌谜数量众多有特色。这些都非常值得研究，在搜集中便要注意此类谜语的挖掘。

四、代表性

代表性指所收作品，在时间上久经考验，有较强的延续性；在空间上流传比较广，有一定程度的覆盖面；在本地区、本民族中有一定影响。因此在调查搜集和编纂中，也要重视优秀传承人的重点发掘和作品整理出版。谜语广泛流传在各地民众口头之上，大多数民众能讲少量的谜语且重复较多。但也有部分民间谜家掌握大量谜语，这是地方谜语的宝库，一定要给予充分的重视。比如河南周口发现民间谜语艺术家高新慧老人，出身名门，自小读书，能讲上千则谜语。在搜集过程中，地方文化部门已阶段性地出版了《高新慧民间谜语》《项城谜语》《沈丘谜语大全》《中华谜歌大观》等谜语书籍，为“大系出版工程”谜语卷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在编选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谜语分类和排序

由于谜面侧重点的不同，一个谜语在不同类别中重复和交叉出现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编纂者要根据具体谜面描述的侧重点来分析其类别。如果侧重于静态物的描写，则归为物谜，那些描述事情经过的归为事谜，这一点也可通过谜目来区分。另外类别有交叉的，如谜底有三四种事物，既有动物，又有植物或其他，则放在“其他类”。

谜语顺序排列方面，先按照民间惯用的顺序排列先后，在此基础上，无法排列的再按照音序。另外以音序排列，容易导致同一类别中的谜语分散各处，这种情况要遵循以下排序原则：谜语整体分类以内容为依据排序，字谜部分按照笔画。一个谜底的谜语可能有多个异文，要全部收录，并将相同区域的排列在一起。

二、谜语的异文

在谜语卷编纂的实施中，我们尽可能统一行动、全面搜集各类民间谜语。但在实际的

谜语采录过程中，也发现地方民协工作者在分头行动收录，然后统一整理时，往往会搜集同一谜语的大量异文。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方法如下：如果差异较大，就全部收录；而对于谜面只有个别文字差异，几近完全重复的谜语，则应只保留最接近口语习惯与文义最切当的谜面，不必重复收录；此外，对地方色彩较为浓厚的部分谜语异文，要保持其地方文化特色与地方方言特征。

三、谜语的收录范围

谜语是民众生活的反映，并随着人们多样化的生活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谜语卷主要收录民间传统谜语，部分典型的当代灯谜作品也拟作为附录少量收录。民间传统谜语与文人灯谜各具特色、不同之处特征明晰。一般说来，民间传统谜语在语言上较为通俗直白、口语化特色鲜明；文人灯谜用词典雅，多用典故，间或使用谜格。在结构上，传统民间谜语由谜面、谜目、谜底三部分组成；而灯谜在此基础上，还要增加谜格。

谜语是中国民间社会认知世界的百科全书，它与民族心智与审美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库。因此，科学全面地搜集整理和规范地编纂出版，对于保护传承民间谜语意义重大。同时这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方式。

“谜语卷” 编纂体例解读及有关问题探讨

郑育斌¹

谜语起源于民间，古称“廋辞”“隐语”等。东汉学者赵晔的《吴越春秋》中收入了上古时代一首民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被称为《弹歌》的民歌，是一则非常典型的隐语，它以隐喻手法高度概括了制作弹弓、猎取野兽的过程。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龙》中指出：“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文心雕龙》书中的《谐隐》篇，系统阐述了谜语的起源、特点及功用。隐语的含义是“遁词以隐意，譎譬以指事”（《文心雕龙》），它包含了测智成分，诚如已故民俗学家乌丙安所述：“民间的谜语是民间表现智慧、测试智慧并培养智慧的一种口头艺术的特殊形式。”（《民间文学概论》）。经过数千年的演化，谜语已发展成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民间艺术，

¹郑育斌，“大系”谜语专家组副组长，中国民协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的启动，对于抢救、保护和传承中国谜语文化遗产，意义重大。自2018年7月3日在江苏徐州召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编纂工作会议之后，各分卷谜语专家组陆续付诸行动。可以说，“谜语卷”编纂工作开局良好，其将产生的效应非常值得期待。

“谜语卷”编纂体例下发以来，各地在谜语采编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需要在编纂体例这个总纲之下进一步明确一些具体要求。本文结合已启动卷本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围绕“谜语卷”编纂体例作深入的解读，供各地参与采编的人士参考。

一、谜语收集的范围。当代学界通常把民间谜语称为事物谜，而把那些以谜底文字的音、形、义为依据创作出来的谜语称为文义谜（灯谜）。虽然这种划分方式在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已基本成为共识。事物谜是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学体裁，它与文义谜一样由谜面、谜目、谜底三个要素组成，谜面语句朗朗上口、简洁生动。谜语多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民间，猜射者需根据谜面所喻示的事物特征、功能、形状等去寻求作为谜底的事物。文义谜与民间谜语一样都是从古代的隐语和廋辞演变而来的，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文义谜是利用汉字的一字多义、一字多音、笔划结构形态及其变化等特点而制作出来的，要求用字精炼，而且适合写在谜笺上供人猜射，少数文义谜还带有谜格。央视连续三年举办的大型益智文化节目《中国谜语大会》的赛题，就以文义谜为主，但也有少量事物谜。“谜语卷”所要采集的谜语，是指在民间流传的事物谜，文义谜一概不收。所以，“谜语卷”编纂体例中明确指出，“谜语卷”收录的“主要是在民间流传的谜语，而非文人谜语（灯谜）”，各地采编人员务必明确。

二、谜语的分类。按照“谜语卷”编纂体例的要求，“谜语卷”的纲目包括“物谜”“事谜”“字谜”“其他”。可以这样理解，广义的物谜本应包括字谜，但鉴于字谜在谜语中占有较大比例，所以单列一类收录字谜。凡是不能归入“物谜”“事谜”“字谜”范围的谜语，则录入纲目中的“其他”。谜底为人物的谜语，建议编入“其他”之中。需要说明的是，以人物为谜底的谜语与以人名为谜底的文义谜不同，因为以人物为谜底的谜语，谜底不必局限于特定人名（如“关公”，也可叫“关羽”或“关云长”），而以人名为谜

底的文义谜，谜底局限于特定人名（如谜底“关公”不允许替换为“关羽”或“关云长”）。故事形式的谜语，不必全部归入“其他”之中，而是要辨认谜底具体意义后归入相应类别。

三、谜底事物的异名问题。在编纂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物谜或事谜的谜底异名的问题。比如，南方所称的“老鼠”，北方人常称为“耗子”，有的地方还称为“臭鼠”“米耗子”“坎精”等。作为谜底的事物，可能因地方不同而叫法不同，对此，应该以该谜语流传地区的常用叫法为准，而不宜笼统地以一种叫法采录，以保持谜语原汁原味，凸显地域民间文化特色。

四、谜语的方言问题。中国地域广阔，方言甚多，仅就闽语来说，就有闽东语、闽南语、闽北语、闽中语、莆仙语等。我们采集谜语时要尽量保留方言、土语，无须刻意“翻译”成规范的普通话。举个例子，福建龙岩有一条以“老鼠”为谜底的谜语：“两撇胡秋贼头修，一对眼珠乌溜溜，翻上炕桌偷吃油。”首句中的“胡秋”和“修”为当地方言，“胡秋”意为“胡子”，“修”意为“小巧而长”。像这样的谜语，采集整理时应保留方言、土语，如此才能真实反映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对谜语中的方言、土语要适当注释，建议既注音又释义。

五、谜语的雅俗问题。谜语的雅与俗其实并无明确的界限，应视谜语具体语境把握，只要符合谜语特征并具有一定审美价值、文化价值或娱乐价值的谜语，便应酌情收录，既不可重俗轻雅，也不宜重雅轻俗。比如，福建诏安流传的“吹火管”谜语：“风流子，风流子，红粉佳人吻着你。叫声夫啊夫，待不到光明不放你。”该谜语以长短句形式创作，描写刻画生动传神，用闽南语诵读起来音韵悠扬。像这类极具民间口头文学特质的谜语，只要其内容不明显具有粗俗性，理应予以收录。

六、谜语的民族特色。中国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文化，并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谜语文化，这在“谜语卷”中应予以充分体现。收集少数民族谜语作品时务必忠实翻译，尽量保持其民族特色，尤其是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特点和审美习惯，力求准确地表达谜语原意，切不可按汉族谜语方式随意套译。

七、谜语的歌谣形式。“谜语卷”编纂体例明确要求：“一些谜语用民歌形式流传和

保存的，要酌情收入，不可视为歌谣而删去。”这一点说明十分必要。早在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作家朱自清著作《中国歌谣》书中就记录多条歌谣形式的谜语，例如以“烟”为谜底的谜语：“望去一条桥，走去软么么，好的斧头斩不断。一阵风来就吹断。”这则歌谣形式谜语借桥喻烟，十分生动传神。其实，民间谜语很多是以歌谣形式流传的，如果歌谣形式的谜语弃之不用，那么民间谜语势必逊色不少。

我国的优秀民间谜语浩如烟海，作品内容包罗万象，语言特点、表现手法、地域特色各异，因而“谜语卷”采编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本着“科学性、地域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多沟通、多交流、多探讨，就一定能凝聚共识，有效解决采编中的问题，科学有序推进编纂工作。我深信，在中国民协的有力统筹下，在各地民俗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必定能高效率完成这项重大文化工程，为中国谜语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发展做出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贡献。

河南谜语的传承与搜集整理

刘二安¹

河南地处中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先民最早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谜语，同样滥觞于中原，发展于中原，兴盛于中原。从古至今，河南各地都流传着大量谜语。90多年前，白启明先生辑录的《河南谜语》，由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出版，“它可以说是我国民间谜语，特别是北方地区民间谜语的一种代表性的集子”（见《中华谜书集成》第三册）。刘万章先生在序言中说：“我盼望彼地人士，或有趣味的同志，对于学术富源的河南省民间文艺，继续白先生的工作，那么岂但白先生的亡魂安慰吗？”但从白启明先生之后，尚未进行过全面的、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又与谜语失之交臂。但我们却并未放弃搜集与整理谜语的工作。在搜集歌谣的同时，对其中的谜语也进行了整理，编入《中国歌谣集成·河南卷》“谜谣”中。河南省民协灯谜学委员会在开展灯谜活动编印灯谜书刊时，也将谜语作为其中的内容，在谜刊中开辟民间谜语专栏，还编印出版了一些谜语书籍。可

¹刘二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主编，河南安阳文化宫高级艺术家。

以说，民国初年以白启明先生《河南谜语》、袁俊杰先生《河南修武谜语》以及白寿彝先生有关河南谜语研究为象征的“河南谜语现象”，与当代以“河南省民协灯谜学委员会”，以及由他们编纂的《灯谜中原》《中华灯谜年鉴》《中国谜语库》等灯谜典籍、《全国灯谜信息》《春灯》《谜也者》等谜刊为象征的“河南灯谜现象”，是一脉相传的。

在获悉将要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时，我们便将已有资料进行了梳理，搜集河南谜语书籍 20 余种。在筹备期间，我们专门到谜语资源较为丰富的周口市进行考察，发现周口市的项城等县市都有谜语书出版，华威民俗博物苑还将谜语与生活用品、农具等实物结合起来展示。

目前，河南省的谜语非遗项目，有省级一处，市级一处，县级四处，省市县三级谜语代表性传承人 7 人，这些非遗项目所在地及传承人，也是我们编纂工作的根据地和骨干力量。

2018 年 7 月确定由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示范卷后，我们迅速面向全省征集谜语资料，在安阳、周口、平顶山召开三次启动会，组织编辑人员，迅速在全省铺开。我们的一些具体作法是：

一、充分利用“三套集成”原有资料，搜集自民国以来已编印出版的谜语书籍，以及其它民间文艺书刊、地方志、民俗志等所刊载的谜语。编委会将有关资料整理后按流传地域转发给了有关省辖市供选编。

二、发挥“三套集成”参与人员以及当地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挥各级民协会会员尤其是灯谜委员会会员的创造性，发挥非遗传承人的自觉性。

三、田野调查虽然时间紧迫，但克服困难也要前进。一些地方将任务分配到基层，开展田野调查。我们建立了全省谜语卷工作群，许多地方也建立了当地的微信群，通过微信群征集了数千条谜语。

经过一个月左右时间，征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我们及时转入汇总、编辑阶段。先后召开了安阳、豫北、郑州周边城市、豫南、周口五次编纂工作会，结合编辑实践，对书写格式及一些未尽事宜，进行了讨论。

与一年一度的河南省谜会结合，2018 年 10 月 18 日，我们在项城市举办了河南省第

32届谜会，命名了一批“河南省民间谜语之乡”“河南省民间谜语艺术家”，以河南各地流传较广的民间谜语作为赛题，进行河南民间谜语竞猜比赛。为全面征集和研究河南谜语，为纪念白启明《河南谜语》出版90周年，我们还发起举办“河南谜语研讨会”征稿活动，收到十余篇相关论文，评选了优秀论文，编印了研讨会专辑。

三个月来，我们共搜集3万余首民间谜语，取得了初步成果，《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的初稿编纂完成，共选编4000余种谜底、17000余首谜语，于10月下旬交初稿。11月10至11日，“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召开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专家审稿会。按照专家组的意见，编辑部成员按照各自分工，开始修改初稿，在2019年年初完成了第二稿。2019年2月，我们又根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学术委员会终审意见，修改完成第三稿。书稿目前已交出版社审定。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是遵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制订的“谜语卷编纂体例”和有关文件精神，本着科学性、全面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原则加以选辑的。所选谜语，主要是由河南省各辖市文联、民协组织会员搜集、整理，部分谜语是从“五四”以来，河南民间文学工作者、学者所编纂的谜语书籍及有关文章中选编，还有部分选自河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及其它民间文学刊物、河南各类地方志书籍。

按照谜底所指事物性质，河南卷选编时大体分为物谜、事谜、字谜，不能列入以上各类的另列为其他类。在“谜语卷编纂体例”所列分类的基础上，我们根据本省实际情况进行了分类。其中物谜、事谜、字谜完全按照“谜语卷编纂体例”，在其他类中，收入了词语（地名、人名、年号等）、连环谜语、歌谣谜语、故事谜语。一般认为民间谜语主要是事物谜，专有名词难以在民间谜语中得到反映，但从搜集到的谜语中，各地都发现流传有地名、人名、年号等名词为谜底的谜语，因而增设了“词语类”；传统的民间谜语是以四句一首的形式出现，一般只有一个谜底。连环谜是出谜人先出一个谜面，猜着谜底后继续出，谜与谜之间呈单一扣合关系，是无法列入“编纂体例”分类的，因此增设了“连环谜语”类别；河南歌谣谜语以信阳为代表，在劳动、生活中产生了大量的歌谣谜语，歌谣谜语是河南谜语的一大特色，增设“歌谣谜语”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灯谜与谜语本是同源同宗且谜理谜法胶着并存，致使灯谜的概念一产生就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狭义概念的灯谜专指文义谜，广义概念的灯谜概念等同于谜语，既指文义谜，也包括事物谜（民间谜语）。为全面反映河南谜语状况，本卷还附录了当代河南灯谜佳作选、当代河南灯谜代表作。

民国时期出版的《河南谜语》，是我国较早的地方谜语选集，曾在民俗界产生较大影响，当时就有学者将河南谜语与浙江金华谜语、广州谜语，作为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代表形式进行比较。今天，河南有幸被列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的示范卷，经过全省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按时完成了初稿的编纂，愿作为引玉之砖，供民间谜语界参考，并期望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展对民间谜语及河南谜语的深入研究。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京津冀（合卷）》河北部分编纂工作回顾与思考

刘英魁 吴桐¹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京津冀（合卷）》河北部分是河北省民协在新时代新世纪承担的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该卷为国家级示范卷，河北省民协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在接到任务后，迅速组织全省相关民间文艺家，开展座谈调研，在积极发动广泛收集的基础上，编委会严格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四性”原则进行筛选编纂。

纵览整个编纂过程，河北“谜语分卷”立足燕赵大地历史传承，注重河北民间文脉的梳理，力争保持本卷的地域特色，在无历史蓝本可循的情况下，完成了此项工作。现就编纂工作，做如下回顾与思考。

一、河北民间谜语的源流与学术界定

本卷收集的谜语为民间谜语，是广泛流传于河北民间大地，口口相传具有原生态特征的谜语，剔除了现当代创作的灯谜，因此，河北谜语在历史追溯上具有典型的燕赵风骨，其学术界定也与历史源流紧密相连。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先秦时期史料记载的“彘辞隐语”、“赋体隐语”和释梦。“彘辞隐语”，如燕

¹刘英魁，邯郸市第四中学高级教师；吴桐，张家口市民协主席。

赵外交中的“鹬蚌相争”；赋体隐语，以荀子《蚕赋》《针赋》为代表；释梦，如《史记·赵世家》中的释梦故事。

二是从汉代开始出现的“离合式”“增损法”。此时的谜语不再是以物拟谜，而是从字形拆解拟谜。例如，曹操与杨修之间斗智的“门阔之谜”、“一人一口酥”以及曹娥碑的“绝妙好词”等，与先前的谜语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文人谜语侧重于字形的离合别解，而非事物形态赋陈了，逐渐发展为后来的“文义谜”，人们习惯称之为“灯谜”。

三是明清时期开始发展为清晰的两个方向。文人们传承了灯谜方向。如河北冀县人李澎（字月潭，号酉山堂主人），清苑人陈浚畴，信都人李春湖等创作了大量的灯谜作品，编辑发行了《十五家妙契同岑集谜选》《知非斋谜稿》《西峰书室谜稿》等；乡村贤人百姓继承了形态赋陈的拟谜技法，将谜语深入坊间百姓家，因时物而发，被文人们视为“民间谜语”。

由此，我们将“体目文字”的归类为“文人灯谜”，将“图象品物”的归类为“民间谜语”。在谜作筛选上，将时间范畴界定在近百年，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白话表达的作品；在取舍标准上，以“体目文字，图象品物”为分野。同时参考谜语界的一般界定：将采用歌谣式来描摹事物形态拟作谜面的归类为民间谜语，将运用离合别解技巧来拟制诗句式谜面的归类为文人灯谜；相对文人灯谜主要借助于书面文字来传播传承，而民间谜语的传播传承，主要是以口耳相传为基本方式，只有在搜集研究者那里，才会形诸于文字。将有明确作者的归类为“文人灯谜”，将无“版权归属”的归类为“民间谜语”。

二、河北民间谜语的搜集与整理

在如何收集的问题上，主要抓了两点：

第一，开展编纂会与座谈会。河北民协在接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京津冀（合卷）》河北部分的编纂任务后，立刻成立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专家投入到前期筹备工作中，省民协主席郑一民两次牵头组织召开编纂会，就谜语卷的工作思路、方法、编纂体例、图片征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指导。编委会专程赴承德、廊坊、张家口等地召开了谜语搜集整理座谈会，与基层民间文艺工作者进行座谈交流。引导大家打开了收集思路与方法，使承

德谜语收集工作从零迅速上升到近千条。

第二，采用“网络+田野”手段拓宽收集渠道。在河北省民协发出征集通知后，各市、县民协积极行动，通过微信群、QQ群、公众号等媒体迅速发启事发通知，进行汇集交流，同时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田野调查采风。省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杨荣国为掌握第一手民间谜语资料，摸清河北省民间谜语的分布情况和民间特征，带领采风小分队深入到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行唐县等地，走访村干部、民间故事家，坐在老乡炕头与乡村“谜篓子”拉家常，说谜语，搜集到一批民间语言鲜活、谜面、谜底种类丰富的作品。

同时，广大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和谜语爱好者深入村庄农户，走访图书馆、史志室、旧书摊、个人书橱，查阅当地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卷本及地方史志、村志等书籍资料，通过各种形式来收集整理，最终发掘出流行于河北的民间谜语两万余条，共分四大类36个小类，连猜谜、斗谜、说唱谜、故事谜等66条，总计入选谜卷8090条。

三、编纂体例的探讨

在编纂体例方面，我们遵循“谜语卷”总编委会的体例规范。但对编纂中遇到的问题，也与专家们进行了沟通探讨，在研讨中敲定解决办法。

第一，关于异文的取舍。河北地域广阔，物产丰富。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名物称谓差异，方言交际差异，形成了河北谜语的地方特色。

依方言与物产的组合，河北谜语流行主要形成了五大区域。一是以邯郸、邢台、石家庄西部地区为主，晋方言为匹配的冀南太行区域；二是以邯郸、衡水、沧州东部县市为主体，中原官话为匹配的运河两岸区域；三是以邢台、石家庄、保定县市为主体，以北方官话为匹配的冀中平原区域；四是以廊坊、承德、张家口为主体，以北京官话为匹配的京北燕山区域；五是以沧州、唐山、秦皇岛为主体，以北方官话津唐方言为匹配的环绕渤海区域。

由于区域的差别，异文的情形十分复杂：例如：谜底为花生的谜语，谜面有：“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晋方言：“麻屋的，红帐的，里面住个白胖的。”北京方言：“麻屋子儿，红帐子儿，里面住个白胖儿。”在编选时，如果保留异文，三种方言，乘以三种异文，就要保留九条。面对这样情况，我们只编入了典型的谜作。

第二，关于谜作排序的取舍。由于地域、民族、方言种种因素，致使同一物体，具有不同的称谓。如：老鼠与耗子、蛇与长虫、蟋蟀与促织子、蝉与知了、大勺与马勺、大碗与海碗、馒头与馍馍，不胜枚举。如果按照谜底音序排列，同一事物的谜面，就会排列在不同的序位。为给读者查阅的方便，使其相对集中，确定了括号加注的方式，即“老鼠（耗子）”，以普通称谓为排序主词，以方言称谓为依附，这样，就使同一事物的谜面集中在一起。

第三，关于方言音与字的取舍。收集上来的民间谜语，由于收集者的语言功底，难于对方言发音找到相应的汉字，就用拼音来书写，用页底加注的方式来处理。

本卷是第一部全面展示河北民间谜语的集结本，有着重要的文学档案价值，也必将为后世民间文学创作提供思路与参考。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难免有遗漏与差错，殷切希望更多专家学者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我国民间谜语的地域分布特点：大同小异

刘二安 杜心宁¹

民国初年，我国民俗学运动兴起伊始，民间谜语即是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谜语的搜集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较著名的，有《谜史》（钱南扬）、《河南谜语》（白启明）、《宁波谜语》（王鞠侯）、《广州谜语》（刘万章）、《金华各属谜语》（曹松叶）。这几部谜语书籍，代表了新文化运动中民俗学者收集民间谜语的早期成果。顾颉刚先生在《广州谜语》序文中称：“万章先生这册，数量虽不多，但发刊的民众谜语的专集，这还是第一回（书铺里出版的谜语集，是小学生的补充读物，说不定有许多是编辑先生做出来的）。”钟敬文先生在序文中称：“纯粹为学术的研究而辑集的材料，万章此本，是破天荒的第一部。”《中华谜书集成》称《河南谜语》“可以说是我国民间谜语、特别是北方地区民间谜语的一种代表性的集子。”

民间谜语的来源，是从各地民众中搜集所得，其地域特点自然非常分明，除《谜史》

¹刘二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主编，河南安阳文化宫高级艺术家。杜心宁，《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湖北卷》主编，湖北省民协谜语专业委员会主任。

是纵向研究谜语历史外，这一时期出版的其它几部重要谜语书籍，都是横向搜集流传在各地的谜语，从其书名便可明显看出——囊括全省的河南，注重一地的广州、宁波，“金华各属”则是指金华地区下属各县，包括金华、义乌、东阳、磐安、浦江、兰溪、永康、武义等八县。其作者都是搜集本人所在地的谜语，《河南谜语》的作者白启明，河南南阳人；《广州谜语》的作者刘万章，广东海丰人；《宁波谜语》的作者王鞠侯，浙江慈溪人；《金华各属谜语》的作者曹松叶，浙江金华人。他们用自己所熟悉的方言，辑录家乡流传的谜语，从这些谜语书籍中，我们可以窥见我国民间谜语的地域分布特点。

民俗界很早就注意到了这几部谜语书籍所代表的地域特点，曹松叶撰写的《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谜语：一个简单的比较》一文（刊《民俗》周刊第96至99期合刊），就认为“歌谣与故事，因收集的材料较多，已早有人比较其异同，研究其转变；谜语方面，因收集材料尚少，探讨之人，尚未多见。”他取《河南谜语》《金华各属谜语》《广州谜语》作为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代表，列表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在比较之后，作者认为：“看上边的表，有几首是一致的，有几首是几全相同的，大多数是相似的；所以我们起码可说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谜语，有许多是类似的。至于谜语为什么类似，或因谜语能走路的原因，或因自然的契合，或有其他原因，要等将来材料加多，才可以下判断。”

王鞠侯在《宁波谜语序》中也提到：“几年前，在北大《歌谣》周刊里，读到了白启明先生的《河南民众文艺之一（谜语）的例举及其类目》（五十三号四版，十三年五月），我便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河南的谜语，竟有许多和我小时候听到的相类似。因此引起了搜集民众文艺的兴趣。河南的谜语里，有许多和宁波的相似……”

刘万章在《河南谜语序》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这何尝不是大同小异的呢！关于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让我再举下去，那末，这序文就过长了，我在这个‘昏心’的当儿，也没有再详举下去的勇气。预备将来，谜语的材料多一点，才做个系统上的研究，此刻暂时这样。颉刚先生序《广州儿歌》有云：

“……我们可以知道歌谣是会走路的：它会从江苏浮南海而至广东，也会从广东超东海而至江苏。究竟那一首从那里出发的呢？这未经详细的研究，我们不敢随便断，我们只能说这两地的民间文艺，确有互相流转的事实。其实，不独歌谣为然，就是民间传说、谜

语……都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敬文的所谓改削，恐怕就要用一种研究的手续，得到结果的时候，才能够决定的吧！敬文以为然否？”

曹松叶说：“至于谜语为什么类似，或因谜语能走路的缘故，或因自然的契合，或有其他原因，要等将来材料加多，才可以下判断。”

目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的编纂，为谜语研究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料，我们试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谜语：一个简单的比较》中的一两个谜例，结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省级示范卷河南、湖北、京津冀（“合卷”）三个卷本中相同的事物谜，再作一番比较。

算盘

《河南谜语》：一宅分为两院，五男二女成家，一时打的乱如麻，只等清明方罢。

《金华各属谜语》：一宅分为两院，五男二女成家，有事齐来乱打，打得分明才罢。

《广州谜语》：一间房子两边过，五男二女齐齐坐，何事打起来，因为家才分未妥。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一家分两院，两院子孙多，多的倒比少的少，少的倒比多的多。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京津冀（合卷）》河北部分：一家儿分俩院儿，俩院儿子女多，多的比少的少，少的比多的多。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湖北卷》：五男二女分家，打得纷乱如麻，若问几时了结，直到清明方罢。

狗

《河南谜语》：四根柱，顶根梁。前头敲梆子，后头耍毛枪。

《金华各属谜语》：四根柱，一根梁，前头锣，后头枪。

《广州谜语》：一根梁，四根柱，头打鼓，尾担枪。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河南卷》：四根棍，顶个鼓，前面唱，后面舞。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京津冀（合卷）》河北部分：四根柱子一个梁，前头敲梆子，后头摇鸟枪。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湖北卷》：四根棍，抬根梁，有人来，吵一场。

从以上谜例看，河北、河南、湖北、广东自北而南分别相邻，因方言南北差异，河南河北许多谜例极其相似，而与广东、湖北、浙江有着明显的语言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仅仅是语言（方言）方面的，并不能掩盖谜语所表现的相同事物。我国民间谜语的地域分布特点，可以概括为大同小异，由于资料所限，本文未能进一步展开。

民国几部谜语集，《河南谜语》900余首，《金华各属谜语》495首，《广州谜语》100余首，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的三个省级示范卷，所收谜语总数量约在3万首左右，当然其中有较多的异文。即使不算异文，数量也有巨大的相差。民国初年民俗学者依靠个人的力量，开创搜集整理地方民间谜语的先河，为今天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由各级民协组织实施谜语卷的编纂，比先辈的条件优越的太多。《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省级示范卷的编纂，将为谜语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我们期盼民间谜语研究者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多方位的研究。

· 各地推进会动态 ·

四川省民协召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2019年编纂工作会

5月14日，“大系出版工程”·四川少数民族歌谣卷、四川故事卷编纂工作启动会在省文联三楼会议室召开。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兵，中国民协副主席、省民协名誉主席沙马拉毅，省民协主席孟燕和参加具体选编工作的编纂人员与会。会议印发学习了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李屹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省民协副秘书长黄红军汇报了近日召开的“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第六次协调会的具体情况和2018年四川省《大系》编纂任务的完成情况。据悉，由四川省民协负责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

谣·四川汉族卷》将作为“大系出版工程”首批示范卷在今年10月1日前正式出版发行。

李兵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针对四川省的《大系》编纂工作提了三点意见。一是要高度重视。他说，“大系出版工程”是一项国家重大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大系》编纂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业务性，希望协会在编委会的指导下把编纂工作做好，做扎实。二要精心谋划，把“大系出版工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全体编纂人员要学习领会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做好编纂工作，提高编纂质量。三是要提倡专业精神，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在进行田野调查时要注重原生态，不要人为加工创作，要从四川的实情出发，充分吸收整理四川现有的民间文艺成果、资料，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他最后说，推进实施“大系出版工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我省的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团结协作，按时保质完成编纂任务。

沙马拉毅主席和孟燕主席在会上都做了讲话。孟主席在讲话中表示，李兵同志的讲话内涵丰富，有很强的针对性，为省民协今后的编纂工作指明了方向。她希望协会加大对“大系出版工程”的宣传，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参与编纂的人员要全力投入，要高质量、高水准完成编纂任务。

会议明确了《大系》2019年四川省的编纂任务，并将具体选编任务分组落实到了每一个人，力争在2019年底完成今年的选编任务。

（彭丹）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安徽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在安庆召开

为切实推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安徽省说唱卷的工作进度，按照“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部署，中国民协理论研究处处长、“大系出

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锦强，国家非遗保护委员会委员、“大系”说唱专家组副组长常祥霖，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大系”说唱专家组成员李永平教授一行，于5月13日至15日赴安徽省安庆市召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安徽卷》编纂工作推进会”，了解编纂工作进展情况、解答编纂过程中出现的学术问题。

安徽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艳，省民协秘书长穆仲夏及安庆市文联党组书记潘功喜、市文联副主席胡越忠，与安徽省说唱卷编委会成员、工作人员等近二十人共同参加本次会议。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安徽卷》是“大系出版工程”民间说唱类的第一批省级示范卷之一，于2018年8月启动编纂，通过音、视频及文字形式采录、整理流传于安徽民间的30多种说唱艺术形式，分“大书卷”“综合卷”设卷。安徽省曲协名誉主席、国家一级编剧、“大书卷”主编谢德裕，安徽省剧协副主席、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综合卷”主编王夔等同志分别汇报了各自卷本的编纂进度及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专家组对此一一做了解释。专家组认为，安徽自古以来就是民间说唱的富集地，是说唱卷中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地域，说唱种类丰富，多种民间说唱艺术在这里发生、发展、交流、融合，文本和视频资料丰富，编纂好安徽卷，对全国其它省市自治区具有示范意义。

王锦强在会上传达了5月12日“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第六次协调会的会议精神，要求编纂工作在时间上需要加快进度，在质量上要精益求精；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政治敏感问题、学术规范和体例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文化使命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王锦强还对说唱卷的编纂体例各组成部分进行了详细说明。

会上，安庆市民协名誉主席、《安庆民间文艺大典》主编叶灏介绍并展示了《安庆民间文艺大典》样书。该书是安庆市民协历时五年搜集并整理的，涵盖安庆民间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书籍。王锦强肯定了安庆市民协所做的贡献与努力，希望该书能够更科学地保存民间文艺资料。

(张礼敏)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湖北省示范卷编纂工作座谈会 在武汉举行

为加快推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湖北省示范卷的编纂工作，5月25至26日，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席邱运华，中国民协理论研究处处长、“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锦强一行来到武汉，了解《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湖北卷本编纂工作进度，解答编纂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并对今后的编纂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和具体安排。

湖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一级巡视员肖伟池，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鄢维新、参与编纂湖北省卷本的专家学者及地市州文联民协主席等3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会议由王锦强主持。他介绍了2018年“大系出版工程”启动以来，首批12个门类55本示范卷的完成情况，并针对在他省卷本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供湖北卷本参考。面对一些共性问题，王锦强指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湖北卷》在编纂的过程中，务必要规范明确，如标题要统一，概述和前言务求理性严谨，分类与排序避免交叉混乱，采录信息力求规范完整等，并对各部分的字数、写作要求、格式等进行了细致而具体的指导。

会上，鄢维新汇报了2018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湖北卷本编纂工作的总体情况及2019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湖北卷拟工作计划。咸宁市民协主席定光平、宜昌市夷陵区民协副主席刘珍、湖北省剧协秘书长宋辉、湖北省民协谜语专业委员会主任杜心宁分别就咸宁长歌、夷陵长歌、小戏、谜语等卷本的工作进度、存在问题、编纂经验进行汇报、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工作中进行了有益思考，提出了有建设性的建议。杜心宁提出“以谜底的首字拼音进行分类”的方法，建议在书后附上拼音缩写，以便读者检索。宋辉在小戏卷的编纂上，建议在书中添加相应剧目的音影视频二维码，丰富卷本的呈现方式。与会人员也在自由发言环节对编纂工作方法、卷本呈现方式、宏观编纂环境等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议的最后，邱运华发表了总结讲话。他高度肯定了湖北省文联对“大系出版工程”的重视，对各级专家学者和地市州民协主席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表示感谢。在听取汇报、翻阅编纂成果的基础上，邱运华认为，湖北的编纂工作推进顺利。就具体的任务而言，他指出，今年要加快剩余 2018 年示范卷编纂工作进度，争取年内出版；编纂 2019 年的卷本时，尤其是小戏卷和长歌卷，要突出湖北民间文艺的鲜明特色；而在制定中期计划时，省文联和省民协要充分发挥统筹、调度作用，对预申报的卷本做到心中有数，有序安排。

邱运华指出，“大系出版工程”工作任务重，时间跨度长，在以后的编纂工作中，要牢牢把握以下三个重点：一是层层压实意识形态的责任意识，主编与团队要秉承“优中选优，予以传承”的原则，妥善处理文本中的迷信、暴力、色情、淫秽内容；二是要牢牢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尊重文本呈现各环节的贡献者；三是要注重文本规范，充分运用注解，在文本中呈现新思想、新研究和新理解。邱运华强调，要将“三个保证”——“保证进度，保证质量，保证意识形态立场的正确性”贯穿始终，确保编纂工作圆满完成。

肖伟池代表湖北省文联和湖北省民协表态，一定坚定信心，整合力量，团结协作，做到“三个保证”，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不辜负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的厚望。

（中国民协供稿）

学术视野

民间文化遗产资源转换的亚洲经验

潘鲁生¹

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包含四大板块、110多项相关活动，亚洲47个国家以及近50个域外国家的代表将参会。其中，亚洲文化嘉年华将有3万余中外人士参加。

¹潘鲁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演讲，倡导文明对话交流互鉴，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提出“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希望“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出席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论坛”等活动。今刊发潘鲁生关于《民间文化遗产资源转换的亚洲经验》一文。

“亚洲经验”(Asian Experiences)一词最早来自经济领域，主要指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以及后来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由于发展阶段、先天禀赋、文化历史的差异，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和问题解决方式往往有自身特点。文化发展，更有内在的复杂性，从亚洲自身的文化现实和视角出发，考察当前生态和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并探讨内在的架构和基本模式，具有现实意义。

一、亚洲国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亚洲整体面积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30%，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60%。亚洲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历史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三大文明古国在亚洲，世界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亚洲，亚洲古老的东方哲学启迪着人类思维，亚洲人的伟大发明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亚洲也曾长期引领世界经济潮流。

在新的发展阶段，亚洲历史文化资源需要有效地传承、转化和创新发展。比如经济领域里，亚洲传统文化价值观发挥了积极作用，“东亚经济发展的斐然成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的文化背景，包括重视教育，敬业奉献，社会和谐，包容开放等精神”。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亚洲精神遗产，获得了新的时代含义，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达观、诚实守信等为代表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在亚洲人的实践中得到了继承和弘扬。应该看到，在更广泛的民间文化资源领域，还蕴藏着亚洲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潜能，需要有效地加以转化和发展。民间资源的有效转化与应用有助于增进亚洲国家的文化认同，深化亚洲国家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知识文化的共同体，为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同时，传统文化资源的设计发现与应用有助于在信息时代为文化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二、亚洲国家民间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基本经验

民间文化遗产资源发展的重要线索在于发现其重要价值并促进活态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关键是使之继续生存繁衍在当代社会空间中，发挥思想、文化、经济的多元作用，而不只是作为文化的标本、档案和历史记忆。“转化”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庞大的民间文化资源亟需与当代设计挂钩，找到再造与重生的新的突破口。近年来，亚洲国家在民间文化资源转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经验，包括以当代设计观念转化传统文化样式，以当代设计语言转化传统文化元素，以当代设计创意产业转化传统文化产业，以当代品牌设计转化传统代工生产。

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家庭模式、新的道德伦理关系的深刻变化，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坐标体系也明显发生变化。生产的过分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和文化的过分精英化、山寨化，正逐渐让位于小型化、多样化、情感化、仪式化、原创化、娱乐化的趋向。在这种观念调整的时代背景下，设计的关注点必然更多地从物质走向文化，从功能靠向情感。传统手工艺等民间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经济边际效用、生态循环意义、生活审美意蕴和人文社会价值等特点，契合和满足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对创新转化的心理需求。传统手工艺等民间文化资源是伴随社会发展和生活实践过程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情感传递和交流的功能，其优势在于个体主观的表现和创造发挥，与当代设计观念的高度融合，不仅可以满足民众生产、生活对日常用品的文化需求，而且可以快速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空间，发挥设计服务大众的最大效能。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使民间文化资源转化为设计资源、品牌资源，依靠优良的设计、精湛的工艺和成功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使民族设计被世界广泛接受，具有重要意义。

三、亚洲国家民间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范式

从亚洲国家民间文化资源转化的基本经验来看，主要有两种基本范式，一是原生态、聚落化传承和发展的“手工艺农村”范式，二是凝练传统文化元素和精神的“设计产业”范式。

首先，亚洲许多国家是传统农业国家，农村是传统文化的天然载体，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富集于农村地区，以农民为创作和生产主体，发展农村手工艺产业，不仅具有生态环保、劳动力密集以及循环经济的特点，以文化为核心驱动，通过整合农村自然和

文化资源，拓展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实现文化富民；而且有助于促进手工艺等民间文化资源的生产性保护，为传统文化传承提供物质保障，促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发展。

其次，就设计产业发展模式而言，重在发掘和发挥民间文化资源的文化辐射和驱动作用。从当代设计的角度来看，生活不是仅为衣食住行而运动的单一程序，它本身也需要一个内在的价值作为指引和督导，生活要在信仰内才能得到最大的体验和满足。当我们越来越重视设计在产业转型、经济升级中的驱动作用时，还需深刻发掘设计驱动力的根源，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技术研发到了一定高度和瓶颈后，更需要“开始在设计上投注更多的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好设计”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看似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在现代设计师的努力下，以新的设计形式可使其文化价值重新被认识，实现新的发展。民间文化资源不应定格为历史档案，应该在当代设计的发现与转化中重获文化的生机。

总之，亚洲国家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自身的文化历史和现实，以开放合作的视野和胸怀促进丰厚文化资源的转化与发展，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化为动力，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将进一步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建设团结美好的亚洲。

· 论文推介 ·

“说唱”概念的历史沿革及学术定位 ——兼论其与“曲艺”及“说唱艺术”之关系

郜冬萍¹

摘要：“说唱”作为一个概念关键词，不断出现在俗文学或民间文学话语中。其所

¹郜冬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文章原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注释和参考文献见原文。

涉及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及发挥的功能，随着社会文化、时代精神的变化而演进，内涵与外延也相应地表现了极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因此，对以上变化的把握，有必要回到历史沿革语境中进行厘清：即先秦至唐，探寻“说唱”发展的历史轨迹；宋至清及近代，分析“说唱”概念正式提出和发生演变的历史背景；20世纪30至50年代，俗文学派有“讲唱文学”概念提出及运用；50至80年代，“曲艺”概念的通行，应从中辨析“说唱”与“曲艺”的细微差别；80年代后，民俗学界探讨“民间说唱”概念。

关键词：说唱；说唱文学；曲艺；说唱艺术

“说唱”概念自其使用以来，就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指涉和外延伸展，它的历史沿革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波及俗文学，后又与民间文学理论的建构都有关系。但“说唱”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和外延均有变化，要说清此问题，很有必要回到“说唱”历史沿革的语境进行厘清。

概括来说，唐之前“说唱”有了零星文字记载并从某些文学作品中可发现其蛛丝马迹。宋至清末，“说唱”概念在各种形式中正式提出，期间不断发生着演变。直至上世纪30年代，以俗文学派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说唱”文学的概念，并对其进行集中解释。80年代开始，民俗学科兴起，学界提出“民间说唱”的概念，并在阐释时涉及到“曲艺”和“说唱艺术”。

说唱与说唱艺术、曲艺、民间说唱，各概念之间既有相同处也有差别，为了厘清“说唱”在历史沿革过程中内涵与外延变化的细微处，且据上述曲艺与说唱艺术概念准确界定民间说唱，有必要回到说唱与曲艺的历史沿革语境，厘清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以便在研究中准确使用概念，有助于研究深入。

一、先秦—唐：“说唱”发展轨迹探寻

“说唱”中的说与唱，艺术形式有三种情况，即“说的、唱的、说唱兼有”。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首先在音乐方面都有曲调和语言紧密结合的特点，字调、语调贯穿于曲调之中，说中带唱、唱中带说，似说似唱、说说唱唱，婉转动听，难解难分。同时，说唱与语言的结合也十分紧密，这是说唱的突出特点，也是说唱得以存在的根本。对于上述说唱

的三种艺术形式，一是可以从说唱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二是从说与唱题材源头进行发展轨迹的探索。

（一）说唱的发展历史

从目前可资稽考的材料看，到唐代时期说唱的史料才逐渐丰富起来，之前说唱处于尚未成熟状态，或者说，民间说唱是在其他民间文学样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神话、传说和故事通过讲说形式表现，史诗和歌谣以歌唱形式表现。尽管有说唱活动，但还没有演化成为相对独立的说唱艺术。

先秦时期，周已有以乐舞戏谑为业的俳优。《荀子·王霸》：“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俳优”指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演多种艺术，说唱艺术是从俳优艺术中分化出来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其中，“间演故事”即具说唱的雏形。

战国时期，出现了以说唱为主的表演形式——成相。成，演奏，演唱；相，乐曲。以荀子的《成相》为代表，有三章，共56节，分为上、中、下三章，每章都以“请成相”（请奏起相来吧）开头。

汉代到隋，说唱的记载依然零零散散。《汉书·武帝纪》：“（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文颖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汉后更名平乐观。”“角抵以角技为义，故所包类广，后世所谓百戏者是也”。角抵之戏为后世百戏，包含有说唱。张衡在《西京赋》写了平乐事，各种杂技都有：“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銛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东汉李尤《平乐观赋》也记录了当时百戏表演的盛况，有力士举鼎、吞刀吐火、投掷飞丸、跳跃剑山的杂技，有头戴鹿象鱼龙各种假面具的击鼓戏舞，还有戏车的表演。文中有“侏儒巨人，戏谑为耦”之句，是说身材反差较大的两个演员以对话的形式进行滑稽表演，用诙谐搞笑的内容吸引观众，这种表演显然属于说唱艺术。四川出土东汉时期两尊击鼓说书书俑是实证，书俑雕法朴拙，说书者形态栩栩如生，眉飞色舞的神态和手舞足蹈的动作，都表现了当时说书者达到了如痴如醉的表演境界。

隋代出现了说笑话的“大王”侯白，据《隋书·陆爽传》附“侯白传”记载：侯白“性滑稽，尤辩俊”，“通悦不恃威仪，好为俳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可见在当时侯白是非常走红的笑星。《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侯白”条引《启颜录》有记载：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膋。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

从这段引文看，“说一个好话”，此处的“话”不是简单的话语或言谈，而是讲一个诙谐幽默的故事。加上上文“观者如市”，表明侯白是在讲有表演性质的故事。

至唐代，说唱作品主要存在于敦煌藏卷中，种类主要有俗讲、变文、话本、故事赋等。中唐晚期形成一种文体——转变，“转”即说唱；“变”是说唱的底本，也指绘有图画的“变相”，即一种配合图画说唱变文故事的表演艺术，也可以理解为说唱是配有图画的变文故事的表演方式。转变所用的图画有两种：一是绘在寺庙墙壁上的壁画，一是绘在画卷上的，如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滨。
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
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
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

王建的《观蛮妓》也可作为参考：

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

谁家年少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

从王建诗所描绘的内容可以看出，演唱形式是转变，配合着画卷有说有唱，演唱者是一位女艺人，说唱内容是非宗教的历史故事。

唐代的变文是散韵结合体，散文和韵文结合的方式主要有：一是散文作为引述，后用韵文歌唱散文部分所述的内容，如《降魔变文》。二是用散文作为“引起”，后用韵文来详细叙述。散文和韵文互相被运用，互相帮助，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有的散文和韵文天衣无缝地连接在一起，如《伍子胥变文》。

（二）从说与唱相互结合的题材源头看

1. 说的方面，试着探讨一下评书、评话与《史记》的渊源。宋元是说唱的发展成熟期，其间形式多样，成就最高的是话本。话本是说话的文本形态，原是说话人敷衍故事的底本。宋代有“说话四家”之说，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一般指小说、讲史、谈经、合生、商谜（合生，又作“合笙”，是一种以诗词状物肖人的伎艺；商谜，是一种猜谜伎艺）四家。讲史一类的内容分量最重，对后世的评书、评话的影响很大。说书人可从《封神榜》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英烈传》，讲史的评书评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观，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的美德和价值观，比如直到今天仍受欢迎的宣讲忠贞爱国思想的杨家将、岳飞故事。那么，宋代讲史的源头在哪里？可从司马迁的《史记》探寻一些线索。如元代刻本《新刊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卷里面有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内容从田光死荐荆轲起，直到荆轲被创之后在咸阳宫倚柱而笑，几乎都是《史记·刺客列传》原文，只是文字更简略一些，稍有出入而已。但与《史记》的直接联系则是确凿无疑的。

2. 唱的方面，试着从韵文唱词中寻找蛛丝马迹。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荀子·成相篇》是说唱韵文中唱词的滥觞。《汉书·艺文志》著录“成相杂辞”十一首，但均未流传下来。荀子仿作的《成相篇》：

“请成相，世之殃：

愚暗愚暗堕贤良。

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依依！”

这一章还有十对上下句的唱词，讲了桀纣垮台，武王建业，比干、箕子、伍子胥、百里奚和孔夫子等的遭际，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见解。整个成相讲了作者理想中的圣王和贤相的形象，既有叙事又有抒情，运用活泼的句式，将叙事、抒情和论说融为一体的章法，同后世似唱似说的数来宝很相似。

3. 说唱兼有，即散韵相间的体裁，试从早期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寻找痕迹。杨宪益先生在《零墨新笺》中有文论及又说又唱的《太子晋篇》，记述的是大乐师师旷会见太子晋的故事。全篇是散文，唯有人物的对话却写成韵文：

师旷：“吾闻太子之语，高于太山！

夜寝不寐，昼居不安，

不远长道，而求一言。”

太子：“吾闻太师将来，甚喜而又惧，

吾年甚少，见子而慑；

尽忘吾度！”

《太子晋篇》散韵相间，可以说是今天河南坠子书、大鼓书、苏州弹词体裁形式上的粉本。

二、宋一清及近代：“说唱”概念正式提出和演进变化

一般认为，最早使用“说唱”概念的是吴自牧。他在《梦粱录》卷二十“妓乐”云：

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

诸宫调是在变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讲述非宗教的故事，流行于宋、金、元。“说唱诸宫调”指“诸宫调”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的表演。“说唱”在此是指诸宫调的表演方式，即“说唱”是对表演方式的具体描述。上文讲到的唐朝时期的“转变”也接近这个意思，即“说唱变文”，可以说变文的表演方式是说唱。《梦梁录》此段文字充分说明两点，一是诸宫调的内容多样，可以将传奇灵怪的故事编进诸宫调。二是说唱诸宫调多为女流并有传承，隐见诸宫调当时在民间深受欢迎的程度。

诸宫调到了元代趋于衰落，散曲兴起。散曲是清唱的，唱时的伴奏乐器有弦索、笙笛、鼓板等，不用锣鼓。魏良辅《曲律》云：“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不必戏场借锣鼓之势。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

到了清代，以“说唱”为表演方式的某种文学形式仍然存在。如臧懋循《负苞堂集》之《负苞堂文选》卷三《弹词小序》中云：“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又如《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记着白秀英上了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韞籍的格范，唤作《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彩不断”。其中又说又唱是最接近于鼓词的说唱文学一类。其实，古代的说唱文学主要指诸如“变文”、“鼓词”、“弹词”、“诸宫调”等文学样式的基本表演方式。

近代，“说唱”的概念仍指某类文学的表演方式，如孙楷第在《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一文中云：

今之说书，有说唱的，有唱而不说的；有说而不唱的。说而不唱，在北方谓之平词。宋时说话情形如何，思索起来，是有趣的问题。以上所说，合生银子儿均与音乐有关；说经起源于唐人之俗文变文，当然是说唱，况且《武林旧事》所记即有弹唱因缘，则说经必为说唱可知。其余只有讲史书一门，不知如何。但《都城纪胜》《梦梁录》于影戏下，皆云：其话本与讲史书颇同。所谓同者，似兼内容奏演二者言之。影戏为说唱无疑；则讲史书者当亦是说唱。然则今日姑假定宋时说话大概为说唱。（话多唱少，则流而为平话。）

今之全唱无说者，俗亦以为说书，实乃宋杂伎中唱赚之遗。诸公词亦有说有唱如是推测，或尚不至于有十分大胆之识乎？”

文中出现的“说唱”，有“说书、平词、说经、弹唱、讲史书、话本、影戏、诸公词”，仔细分析这些“说唱”形式：有说的，如说书、平词、说经、话本、讲史书；有唱的，如弹唱、诸公词；当时说的影戏，目前当是属于戏曲类。孙先生把宋时的这些形式都归于说唱，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是起承上启下作用的，“或尚不至于有十分大胆之识乎？”

从“说唱”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说唱”从古至今都没有成为艺术门类，仅是对某体裁的表演方式使用的描绘性词汇，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民间口头文学的创作和流传方式。从孙楷第的文字解释还可以看出，说唱与音乐（合生银字儿均与音乐有关）和戏曲（影戏为说唱无疑）也有关，此涵盖内容更为广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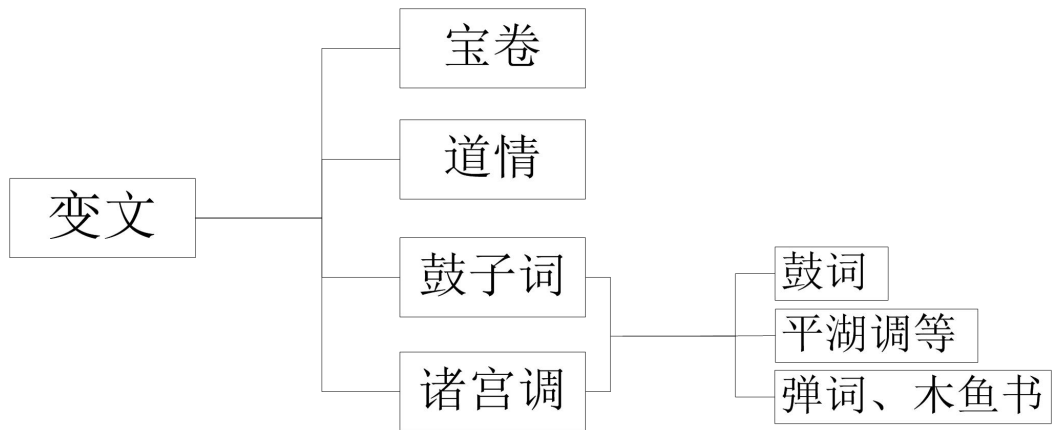
三、20世纪30—50年代：俗文学派对“说唱文学”概念的提出及运用

“说唱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俗文学学派的兴起，说唱文学的研究发生了如下的变化：一是出现了“说唱文学”的概念，同时出现“讲唱文学”提法，其与“说唱文学”是同指关系。二是对说唱文学的研究非常深入。三是研究人员众多。

俗文学派由郑振铎开创，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引了众多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如赵景深、许地山、阿英、冯沅君、黄芝冈、杨荫深、叶德均、孙楷第、朱自清等等。在这个阶段，着力在学术上探析“说唱文学”概念，并对“说唱文学”形式演变过程做出详细阐述的首推郑振铎。郑振铎1938年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明确提出“讲唱文学”概念：“是以说白（散文）来讲述故事，而同时又以唱词（韵文）来歌唱之的；讲与唱互相间杂”。郑振铎还阐述到，讲唱文学在中国俗文学里占了很大部分，所以全书14章，专门谈讲唱文学的就占了5章。郑振铎认为已发现的敦煌文库最重要的文体当属变文，正是因为变文的发现，“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文中提到鼓子词与诸宫调是最早受变文影响，并于宋、金、元三代流行起来的讲唱文学。鼓子词仅见于宋，是士大夫受变文影响后，用宋代的词调来歌唱的典雅作品。诸宫调是宋代以至金元讲唱文学里最伟大的一种文体，在民间深受欢迎，并流传有极高水平的作品，如《刘智远诸宫调》、《西

厢记诸宫调》等。书中还介绍了唐宋流行的“转踏”、“曲破”、“唱赚”的情况。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弹词”也是由变文蜕化而来的讲唱文学，流行于南方。鼓词与子弟书流行于北方，始于变文。大部头鼓词多为金戈铁马、国家兴亡故事。中篇大多讲风月故事。

其后追随者在“说唱文学”方面用力较深的是赵景深和叶德均。赵景深在《说唱文学的源流和体制》一文中，用一个简表表明了他对一些重要讲唱文学的关系：



叶德均在 1959 年版的《宋元明讲唱文学》一书中，专门对中国由宋至明期间，包括陶真、涯词、鼓子词、诸宫调、覆赚、词话、馥说、说唱货郎儿、弹词、鼓词、宣卷等曲艺形式的文学脚本及其历史状况，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30 年代俗文学派讲的“讲唱文学”主要是指曲本文学中散韵相间一类的体裁形式。

四、20 世纪 50—80 年代：“说唱”与“曲艺”概念之辨析

20 世纪 50 年代，“曲艺”概念通行后，为了“说唱”概念使用的严密性，有必要对“说唱”与“曲艺”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进行辨析。“曲艺”概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内涵指涉与外延伸展均有不同。

“曲艺”一词最早见于西汉《礼记·文王世子》：

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斂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曲艺皆誓之，以待又语。三而一有焉，乃进其等，以有序，谓之郊人，远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这里的“曲艺”，郑玄注云：“小技能也。”孔颖达疏云：“曲艺谓小小技术，若医卜之属也。”随着历史的推进，“曲艺”一词的含义也在发生着变化。

唐代诗人元稹在十六岁即贞观十年（794）所作的《代曲江老人百韵》诗里有“曲艺争工巧，雕机变组紃。”此处的“曲艺”也指工艺方面的技能。

公元9世纪，唐代学者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前集卷五）“诡习”篇写到：

张芬曾为韦南康亲随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碓。常于福感寺趺鞠，高及半塔，弹力五斗。尝拣向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严，如人模成焉。

此处的“曲艺”指技巧，文中具体涉及举碑、定碓、趺鞠、弹弓等，既需要技巧还需要力量，属今日杂技之类。

明末清初著名戏剧理论家李渔，在《〈春及堂诗〉跋》（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中使用的“曲艺”：

予之得播虚名，由昔徂今，为王公大人所拂拭者，人谓自嘲风啸月之曲艺始，不知实自采芹入泮之初，受知于登高一人之说项始。

李渔在此用“曲艺”，指不为王公大人看中的“风啸月”诗词、戏曲作品。“曲艺”还指艺术表演，比如：

戊午闰月除日，有为角牴之戏者，……举天下之至险阻者，皆为简易，夫曲艺则亦有

然者矣。（张山来《虞初新志》卷二彭士望（达生）《九牛坝观抵戏记》）

野史氏曰：“呜呼！三岂古师旷之流亚欤？”吾闻师旷无目，三亦无目，是皆盲于目不盲于心耶？然旷以审音擅千古之奇，而三以斯技夸一时之巧，谁谓古今人不相及也？如三者固亦曲艺中之绝无仅有者乎？

予向见锣鼓三奏其技，尝叹曰：“技进乎道矣！今巢阿曲曲传出，宛在目前，方宝池云：‘熟极生巧，曲艺且然，况圣人之道乎？’洵哉！”（缪艮（莲仙）《文章游戏》第三遍卷四《锣鼓三传》）

上述两段文字，前者写于明末清初，句中的“曲艺”指与惊险的“角抵之戏”对举的艺术表演。后者写于清代嘉庆年间，其中两处写到“曲艺”，从文中得知是描述艺人“锣鼓三”的音乐演奏技能。这两则材料说明，在清代中叶，“曲艺”一词由泛指“技能”转向表演性的“技艺”。

1840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资本主义萌芽兴起，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传统文化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曲艺”（指小技能和技艺）一词仍在使用，但又出现了一个词指代民间的说唱艺术和杂技，即“杂耍”。如清代嘉庆年间，清代震钧《天咫偶闻》云：

京师内城，旧亦有戏园。嘉庆初以言官之请，奉旨停止，今无知者矣。以余所及，如隆福寺之景泰园、四牌楼之泰华轩皆是，东安门外金鱼胡同、北城府学胡同皆有戏园。余髫年时，如泰华轩、景泰轩，地安门之乐春芳，皆有杂爨，京师俗称杂耍。其剧多鱼龙曼衍，吐火吞刀，及平话、嘌唱之类。内城士夫皆喜观览，其优人亦间通文墨，吐属近雅，有宋明遗风，今已成广陵散矣。诸园亦废。

此段文字将平话、嘌唱、杂技都囊括在“杂耍”之中。

直到1953年9月“中国曲艺研究会”正式成立，“曲艺”一词成为专指曲艺艺术的

称谓，且还特指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表演的艺术形式。在这期间（1840—1953），“曲艺”、“杂耍”二词都在使用。

“杂耍”一词的使用，如：

天津协盛茶园，于新正某日招人演唱各样词腔杂耍，如拾不闲莲花落、梨花片大鼓、五音相声、双簧等类，杂以小曲戏法，均堪悦耳娱目。”（吴友如主编《点石斋画报》1892—03—16。标点为笔者所加。）

杂耍之属：莲花落，打花鼓，跑旱船，锯大缸，西湖景，数来宝，耍猴，双簧，焰口，道情，倒喇。（林语堂主编《人间世》，1934，10）

各种乡土风味的杂耍，都在这里表演出来，山西梆子、河南坠子、大鼓、小调、京戏、口技、太极拳、碰拐滑稽舞……等，每一次都赢得不少的掌声。（上海申报馆主办《申报周刊》1940，4）

上述文字中“莲花落、梨片大鼓、五音相声、双簧、数来宝、道情、山西梆子、河南坠子”等属于说唱，“跑旱船、锯大缸、耍猴、太极拳”等都属于杂技之类，这两部分都在“杂耍”之内。

“曲艺”一词的使用，如：

生于其时之人，虽最富思想力者，亦仅发而为曲艺小技而止，不能蔚然成一大思想家，且亦不知思想家固为世界智识进步之导师，而思想自由者，固人类之天然权也。（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标点为笔者所加。）

以善裁成之用，兹六艺不足与曲艺小技争一日之短长。秦皇之焚书坑儒，乌得为过举哉！光汉又言、康成释尚书、兼注中候。为数术家言。注天官、说明医理，为方技家言。

注夏官、旁及兵法，为兵家言。凡此诸科，皆所谓曲艺小技耳。（吴虞主编《学衡》。标点为笔者所加。）

此两处的“曲艺”概念内涵与西汉时期一致，均指“小技”。

综上所述，“曲艺”一词最初指“小技”，即非经世致用的技能，后转为各种技艺并升华为各种艺术形式，有时还代指各种精湛的艺术表演。清末至民国时期“曲艺”又成为小技能的总称，同时出现了包括说唱和杂技的“杂耍”概念。整个过程的发展显示出“曲艺”的概念从小技—文学艺术—艺术表演—小技能，经过时间流转发生了一个轮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概念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曲艺改进筹备委员会’，‘曲艺’这个词开始使用。从此，逐渐约定俗成，为大家所承认。”由此开始，“曲艺”一词在北京及各省进一步使用，“曲艺”使用的同时，“杂耍”也在使用。比如：

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为了推进曲艺，……商得北京市文艺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局第二人民教育馆、北京市曲艺公会各单位的同意，联合举办了大众游艺社。参加演出的演员有李兴海、关学增……等及宋慧玲、杨小亭、杨麒麟、杨桂林共有三十余人，演出形式有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莲花落、牌子戏、铁片大鼓、乐亭大鼓、琴书等及翔翎、戏法等杂耍。（《大众游艺社介绍》）

材料充分展示了，“曲艺”的形式有各种说唱如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莲花落、琴书等，也有杂耍如翔翎、戏法等。

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提到“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这里的“曲艺”显然是指说唱。1951年7月初版的《人民首都的天桥》中，杂技、杂耍、曲艺、说唱都在使用，如：“劳动人民所消遣的杂技场子”，“著名的几档子杂耍场”，“我遇到一位俗曲专家韩忠悦先生，他抄给我不少有关天桥俗曲材料，并帮助我将曲艺部分整理”。尤其是第四章“天桥演出的曲艺和杂技的演变”中分为

说唱和软硬杂技两部分。显然，曲艺主要是指说唱，“驴皮影戏手影托偶戏提线戏傀儡戏”按照当下的说法这些属于戏曲。1953年9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国曲艺研究会”，在会上两名杂技界代表列席参加。因此，可以概括地说，“曲艺”一词专指说唱艺术，即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表演的艺术形式的统称。

自此，“曲艺”概念通行后，有些表述如称“河南坠子”、“四弦书”等为“曲艺”而不说“说唱”。像这种以指覆盖范围较广的“曲艺”指范围较窄的“说唱”，无独有偶，在辞书和专著中也有运用。如“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或者“一些说唱曲种的总称”。这样看来，有必要对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进行辨析。第一，历史时间的不同。“说唱”的历史久远，从宋代就提出了此概念，“曲艺”是建国后才出现的比较通行的概念。

第二，学科属性不同。“说唱”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延伸了“讲唱文学”或“说唱文学”概念，并形成了在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俗文学派。“曲艺”的演变可以看出，“曲艺”不管外延大小都属于艺术类。与同样作为艺术概念的“说唱艺术”相比，说唱艺术包括的种类会更多一些，如民间文学中的歌谣、民歌、笑话等的流传均是通过口头语言的“说唱”方式。“说唱艺术”是一个艺术概念，外延更加宽泛一些，内涵具有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将“曲艺”、“说唱”、“说唱艺术”三个概念等同使用，则会出现逻辑、推绎上的不周。

第三，范畴不同。曲艺的范围宽泛，说唱的范围小，曲艺包括说唱。如果不准确使用概念，如用“曲艺”、“曲艺音乐”分别指称“说唱”、“说唱音乐”，显得使用概念不准确。

五、20世纪80年代后：民俗学界阐释“民间说唱”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民俗学学科的兴起，民俗学前辈们在编写民俗学基本理论著作时大多数都涉及“民间说唱”，但是对于这个概念的认识不太统一，大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民间说唱是曲艺中的一大部分。如乌丙安先生论述到：“民间说唱是指现在所称‘曲艺’中的一大部分。曲艺是现代说唱文学艺术的总称。说唱文学既包括那些受文

人创作影响的雅化了的说唱，又包括那些从唐宋以来城市中发展繁荣的市民讲唱体文学，即‘俗文学’，甚至包括部分从上层统治阶级或宗教人士那里传承下来的说唱形式。民间说唱在曲艺中占有主体地位。”二是民间说唱和曲艺等同使用。如钟敬文先生认为，“民间说唱现在一般称‘曲艺’，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汪玢玲先生认为“民间曲艺亦称民间说唱，它是人民口头说唱文学的总称，是一种以文学为基础，配以音乐和表演的综合性说唱艺术。”三是民间说唱就是民间说唱文学。如刘守华先生认为“民间说唱，确切地说，是民间说唱文学，即人民群众运用传统形式编唱并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民间说唱是以说说唱唱的形式来敷演故事或刻画人物形象的口头文学作品。有些论著称为‘曲艺’和‘民间曲艺’。其实民间说唱同民间曲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属于艺术的范畴，它是以文学为基础，配以音乐和表演的综合性艺术，包含着文学、声乐、器乐、表演等因素；而民间说唱侧重于文学方面，主要是从文学角度探讨作为曲艺表演底本的构成与特点，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万建中先生认为“以说唱为主的民间表演艺术形式，又称讲唱文学。”四是民间说唱是说唱曲种的总称。如李慧军先生等认为“民间说唱正式定名为‘曲艺’，是一切说唱曲种的总称，它以说说唱唱的形式，给人说故事，唱故事，说笑话，说情唱情，反映社会生活。”根据上述观点，我们仔细分析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界对“民间说唱”概念的阐释，对这些不太统一的观点的细微处会更加清晰一些：如乌丙安先生认为民间说唱是曲艺的一部分，既包括雅化的说唱文学，又包括古代流传下来的市民讲唱文学，还包括宗教人士流传下来的讲唱文学。这与“民间说唱是指现在所称‘曲艺’中的一大部分”观点相一致。钟敬文先生认为“民间说唱亦称曲艺”，此种说法将民间说唱和曲艺等同起来，是有点以外延大的“曲艺”相称于内涵具体的“民间说唱。”刘守华先生和万建中先生认为民间说唱就是民间说唱文学，这与说唱始终与文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发展轨迹相一致，但与30年代俗文学家们的一些观点又有细微差别，30年代俗文学派主要研究散韵相间一类的文学。刘先生和万先生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一些，有鼓曲、说书、相声等。李慧军先生认为“民间说唱是说唱曲种的总称”。这个观点与当下对说唱的分类相一致，如《曲艺唱词写作知识》一书中把曲艺的曲种分成三类，即以歌唱为主的鼓词、曲词；以讲说为主

的相声、评书；介乎两者之间的以韵诵为主的快板、快书等。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闯关东文化溯源 ——再探东北地区民间文化的智慧源泉

5月2日，由中国民协主办，山东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民协共同承办的“一带一路”民间文化探源工程——闯关东文化的溯源与民间文化生态考察调研活动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圆满收官。此次调研从4月22日开始，调研组沿着“闯关东”线路，深入山东省潍坊市、青岛市，辽宁省盘锦市，吉林省梨树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等地，针对“秃尾巴老李”传说与“闯关东”移民文化以及相关的民间故事、民间信仰、历史、习俗、文化空间等，开展了为期十二天的考察调研活动。中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吕军，中国民协理论研究处处长王锦强，以及山东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民协领导和专家参与了此次活动。

晚清以来，发生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致深入远东地区之间的“闯关东”现象构成了中国近代移民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潮。在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的变迁与融合随之衍生。“闯关东”推动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的挺进，中原文化与关东文化在广袤的东北大地得到了并存发展，四省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4月22日至24日进行的是山东站的考察，调研点包括潍坊市安丘市雹泉村、马宿村、柳毅山，以及青岛市即墨区小龙山、红岛青云宫。

雹泉村因村内有“雹泉”而得名，这里与西汉开国大将李左车有着不解之缘。调研组与当地雹神传说的代表性传承人邹学顺等相关人员共同参观了膏润庙旧址，深入了解了雹

神除暴安良、赍荞麦救江南百姓、将军殿等民间传说的传承保护现状。马宿村曾建有雹泉庙（也称“泉神庙”或“全神庙”）、八角池，因当地人民天旱祈雨，逐渐形成了“雹神”李左车信仰及“秃尾巴老李”传说。柳毅山是山东省潍坊市的历史文化名山，是《柳毅传书》的发源地。2011年，《柳毅的传说》入选国务院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龙山山顶有石潭深十五米，相传是“秃尾巴老李”——黑龙王的水下洞府。自明朝以来，小龙山的龙池内就有僧人、道士以及官吏敬制的多面“龙牌”，设坛求雨向来灵验。每年的六月十三日为龙诞日，当天前来赶会祈福的人络绎不绝。小龙山及其流传的“秃尾巴老李”传说是青岛即墨区民间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位于青岛市红岛街道的青云宫始建于宋代，主要建筑分为东殿（娘娘殿）、正殿（龙王殿）、西殿（龙母殿）。殿梁之上塑有巨龙一条，正是“秃尾巴老李”。青云宫庙会始于1842年，又称青云宫龙母会，也称老妈妈会，每逢农历9月27日（秃尾巴老李的生日）至9月29日（龙母祭日），青云宫庙会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信众前来祭拜祈福。

4月25日至27日，调研组转战辽宁。专家们先在辽河下游贸易的交通要道，也是闯关东重要的码头之一的盘锦市大洼区田庄台镇，考察了田庄台烧锅、胡记宝发祥、刘家果子铺等传统非遗项目和老字号，随后来到甲午战争田庄台遗址，了解田庄台的发展历史与移民情况，并参观了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关帝庙和独具文创精神的辽河民俗博物馆。4月26日，调研组一行走进盘锦市大洼区二界沟镇，走访“古渔雁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刘则亭，参观盘锦远帆船厂，与“二界沟排船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兴华和“二界沟渔家号子”传承人交流座谈，并考察参观了荣兴博物馆与民俗村。二界沟是辽河入海口、辽河三角洲的前沿地带。辽河入海口的渔雁文化由来已久，这里的打鱼人世世代代春来秋去，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捕鱼捞虾，他们被称为“渔雁”。说到渔雁，自然离不开渔船。“排船”是对制造木船的俗称，盘锦二界沟排船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传承历史。荣兴位于盘锦市东南角，东临大辽河，在稻作发展以前，这里呈现了“东商西渔”的地理特征。荣兴稻作虽然仅有数十年的历史，但荣兴的稻作发展史也是中日朝民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

4月27日至28日的吉林站考察，调研组调研了梨树县蔡家镇的柳条边遗址、工匠文

化园和关东农耕博物馆，观摩了当地村民的腰鼓舞、农耕舞、花棍舞和萨满神舞演出。17世纪后半期，为防止外藩入侵，东北地区修筑了总长度 1300 余公里的土堤，并沿壕植柳，谓之“柳条边”。柳条边被废弃后，“闯关东”移民开始大规模进入关东地区。柳条边工匠文化园以木雕的形式展现关东地区农耕文化风貌。在四平市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志清的讲解下，专家们考察参观了种类齐全、主题丰富的关东农耕博物馆展品，深入了解涉及关东地区农耕生活记忆的点点滴滴。

4月29日至5月2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的考察紧扣“闯关东移民生存现状”主题，调研组深入哈尔滨市道外区、牡丹江市爱民区三道关镇放牛村和牡丹江市穆棱市兴源镇的红岩村，了解闯关东移民的商业文化、迁徙经历和心路历程。其中，张云庆老人家中保存的从山东老家带来的详细记载了先祖世系繁衍及重要家族事迹的珍贵资料《无棣张氏族谱》，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调研组一行走进海林市横道河子镇，先后考察了中东铁路博物馆、纯木式建筑东正教堂，并深入柳树村，了解当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状况。

本次活动穿插安排了考察、座谈会、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及时总结了闯关东沿线省份和区域的民间文化智慧经验。参与活动的领导和专家从不同角度发表感想和建言，为闯关东文化的传承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

万建中指出，“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属于大的移民事件，然而当今学术界对“闯关东”族群文化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薄弱。此次考察调研活动在民间文化溯源的视角下，开辟了“闯关东”文化的学术领地，政治意义与学术意义并重。他提出，文化族群需要依靠学者来建构，要组成专业的学术队伍，关注个体与族群的文化历史，找到族群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与共同点，更加重视对于“闯关东”文化的学术研究。

吕军表示，“闯关东”现象是北方民族奋发图强的体现，它对我国历史发展和文化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针对闯关东文化的学术研究需进一步加深，我们应紧扣“一带一路”主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讲话精神，在乡村振兴、东北振兴和精准扶贫等时代背景下，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民生理念结合起来，重视闯关东文化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深入思考闯关东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内在精神，把闯关东文化的

课题立起来，更好地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王锦强谈到，2017年在黑龙江开展的“重拾黑水魂”考察调研活动已经对闯关东文化的探索研究做出了初步尝试。此次考察调研活动，旨在“一带一路”的文化视野下探寻民间文化的留存状况、发展历程和未来方向，加强区域间、板块间的文化融通，促进对民间文化外向型关系的梳理，寻找中国民族各区域、各族群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共同发展的路径，在民间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进行探索、思考和实践。同时，要注重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和本土文化对海外文化的结构性作用，保持本土文化的全局话语权和区域主导权，对闯关东历史文化的背景和当今语境进行渗透、发掘、盘活、利用、放大，提炼闯关东文化精神，集聚东北地区民间文化发展的智慧源泉和坚定力量。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张士闪表示，“秃尾巴老李”传说及其连带的闯关东文化体系是此次调研的一个聚焦点，应关注国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与发展，通过此次考察调研活动，进一步了解四省的基层文化形态与组织机制。他认为，此次考察调研活动触摸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脉搏和中国民间文化的根系，看到了农耕现象背后的村落生活、村民故事和人际关系。在社会变迁发展历程中，应关注民间信仰的传统对接和现代转化。“闯关东”文化精神是一笔极为珍贵的文化财富，“一带一路”的理念不仅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坚定脚步，也是中国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提点和引领。

活动结束后将集结出版学术论文集，旨在为闯关东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和传承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根据程溪所撰“闯关东”调研的系列文章综编)

花馍艺术国庆献礼

5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民协、陕西省文联和渭南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美民间’中国花馍艺术节”在陕西省渭南市桃花源民俗文化园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推动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本次花馍节共有来自全国 11 个省区市的 600 余件花馍作品集体亮相，体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与艺术风格，其中既有涉及节庆、寿诞、丧葬、乔迁等传统民俗题材的花馍作品，也有表现当代生活场景、新风新貌的花馍创作。在新疆展位前，“西瓜”“葡萄”“石榴”琳琅满目，维吾尔族面人“穿”着民族服装，充满丝路文化风情；陕西省大荔县八鱼乡阿寿村的面花仿照药王庙而制，整体雕梁画栋，墙壁以白梅贴面，似象牙玉石雕琢，如万朵梨花绽放；河南三门峡的灯盏馍馍顶上有灯，寓意正月十五点灯祈福……参展花馍的共同之处则在于为花馍赋予时代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开幕仪式上，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丰宽宣布活动开幕。中国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民协主席王勇超，中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周燕屏，国家卫健委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秘书长宋燕，中国民协活动管理处处长李倩，陕西省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丽玲，中共渭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玉娥，以及多位民间文化领域知名专家学出席了开幕式。

周燕屏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花馍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承载着百姓朴素的情感寄托，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多年来中国民协对花馍艺术的传统技艺与民俗文化十分关注，曾在山西、陕西等地举办过多届花馍艺术节。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扩大特色民间艺术影响力，引导群众在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接触中，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

5 月 10 日下午，中国花馍艺术传承发展主题研讨会圆满召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成员、“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顾问陶立璠，原陕西省民协名誉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傅功振，陕西省民协副主席、陕西师大教授张志春，陕西省民协副主席、陕西省艺术馆副馆长修建桥，陕西省民协副主席、西安市非遗办主任王智，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陈山桥，陕西省合阳县文化馆副馆长史耀增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研讨会由万建中主持。

万建中谈到，花馍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粮食艺术，与其他精英艺术有所不同。它的生产道具、制作地点和使用场景都离不开日常生活，是“土”的艺术。同时，花馍也美化了

人民的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美学呈现，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于花馍的保护和传承，宋燕建议，应将各地花馍作品及其背后的故事、寓意集结出版，为花馍的保护、传承、传播、发展奠定基础。

陶立璠表示，花馍和传统生活、民间礼俗、仪式文化紧密相关。有了生活的积淀，花馍才能代代传承。因此，要保护好花馍制作技艺及其所处的生态文化环境，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开花结果。

傅功振介绍，“馍”本是面食，冠以“花”之名便有所不同，花馍的产生源于“礼”，民众制作的花馍在各地礼俗活动中广泛应用，其背后有独特的故事和丰富的寓意，反应的是中国礼俗文化传统。

陈山桥表示，陕西面花是当地民间美术的根基，具有完整的造型体系、文化内涵体系以及俗规禁忌体系，它以民俗文化发轫，通过夸张、变形，添加复合等手法，传承着民间的本源文化内涵，反应了生殖崇拜、生殖繁衍、福禄寿喜的生命主题。

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花馍展示了民间艺术的民族性、群众性和多样性，充分发挥着民间艺术在“美教化、厚人伦、移风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裴诗贇）

系列玉雕创作紧扣国庆主题

5月13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由中国文联、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指导，中国民协和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共同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玉雕主题创作系列活动在中国文联启动。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文，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博物馆首任馆长潘震宙，文化部原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九届专职副主席程路，中医史学泰斗、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李经纬，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刘尚军，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翔，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谢力，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

中心主任徐岫鹁，以及相关行业的领导、嘉宾，在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业内专家学者 70 余人参加了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仪式由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周燕屏主持。

陈建文宣布“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玉雕主题创作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并在讲话中谈到了本次系列活动的三个特点：一、主题重大。“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玉雕主题创作系列活动是中国文联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化艺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题材重大。本次系列活动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和“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代表人物”主题创作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题材，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描绘中国人物，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精神”的集中展示。三、载体重要。玉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当中的核心价值理念，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人文情怀，以玉雕这种独特的形式来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来体现我们中国艺术家的文化情怀和工匠精神，会有令人震撼的效果。艺术家们要传承弘扬传统工艺，结合新时代的特点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贡献力量。

邱运华在致辞中说，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处在社会伟大变革的重要时期，更是我们广大玉雕艺术工作者建功立业、大展身手的黄金时期。弘扬并践行爱国奋斗精神，落脚点在立足本职工作贡献。我们只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波澜壮阔的国家和民族事业中，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进发，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以更加坚定的家国情怀、更加高远的理想追求、更加执着的报国信念投身祖国各项事业，在勇于圆梦的民族自信中实现报国之志。

今天的活动还以“我和我的祖国·玉雕主题创作”为主题举行了座谈会。与会领导和嘉宾就当代玉雕如何与时代同步、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

作为一场向新中国 70 华诞献礼的大型活动，“我和我的祖国”玉雕主题创作系列活动将从 5 月 13 日持续到 11 月 30 日，包括《中国当代玉雕艺术精品集》的编辑出版，“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代表人物”和“百花争艳谱华章”三个玉雕主题创作活动，共四个部分内容。其中，图书编辑出版和玉雕主题作品创作将历时四个月，其后还将举办主题创作作品和《中国当代玉雕艺术精品集》的首展首发仪式。本次活动由中

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中国玉雕艺术委员会共同承办。

(史月妹)

“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考察文献”三十年后重汇集

5月21日下午，“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考察文献”移交仪式暨座谈会在中国民协会议室举行，中国民协退休干部王强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将精心保存30多年的“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考察文献”移交给中国民协。活动由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秘书长邱运华主持。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出席移交仪式并为王强颁发荣誉证书。他表示，王强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对民间文艺事业的热爱和敬意，是文化自觉的生动体现。这份执着和热忱会感动更多的民间文艺从业者，鼓舞大家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

邱运华介绍了此次活动的背景，并受中国民协原副主席刘锡诚委托，介绍了中芬三江考察的工作情况。三江考察是1983年9月动议，1986年4月1日到15日结束，是中国第一次与外国联合对民间文学的考察，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民间文化保护典型项目。期间，中国和芬兰近60名专家学者用科学方法对三江地区的民间文学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后因国内形势的变化没能如期进行出版。王强通过个人努力留存的这份完整资料，为下一步出版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邱运华代表中国民协向王强的无私付出表达了谢意。

王强介绍了三江考察文献的保存过程。作为三江联合考察的主要参与者，他对这份文献有很深的感情，也深知这些资料的珍贵，所以一直将它带在身边，直到确认这份材料能够被妥善接收和出版才愿意交出。这次移交仪式让他如愿以偿，也让他如释重负。

座谈会上，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向云驹，中国民协副秘书长吕军、侯仰军，中国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主任徐岫鹃，中国民协退休干部刘晔原、金茂年、刘晓路、李路阳等同志围绕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考察及文献的利用进行了热烈讨论。

据悉，此次移交文献包括了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考察的专家报告、论文、作品以及相关

文件、书信、报道、照片等。会上，邱运华宣布所移交的“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考察文献”将经中国民协重新编校后出版发行。

（楼一宸）

四川省民协与川师美院共商“集成”大计

5月22日上午，四川省民协与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共同就《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四川卷》编纂工作在川师会议室召开首次磋商会。四川省民协主席孟燕，副秘书长黄红军，四川省民协副主席、四川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王川，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蔡光洁、副院长刘传军，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李江及川师美术学院部分教授、教师与会。此次会议上，四川省民协与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初步达成编纂《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四川卷》合作协议。

会上，孟燕详细介绍了《中国民间工艺集成》项目情况，该项目被中宣部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和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去年9月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赴川调研，推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和该项工作的实施。民间工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省文联、省民协高度重视，前期一直在物色，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编纂班子。以蔡院长领衔的团队，有下面几个特点：一、得到川师大领导的大力支持。二、年轻有干劲。三、有担当，敢挑重担。四、成熟、专业。所以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仔细谋划，不走弯路，按要求高水准完成好这项艰巨而光荣的国家项目。

黄红军在会上强调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和《中国民间工艺集成》项目是中国民协两大重点工程，国家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可见重视程度之高。民间工艺流传千百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启迪思维和创造发明，非常值得挖掘、收集、整理、出版。他提出，在编纂过程中要统一规范，严格按照《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编纂工作手册要求，尽快成立编委会、编辑部，撰写编纂大纲，拿出具体实施方案，使编纂工作有序推进。

王川在会上表示感谢省民协的信任，此次双方能达成共识，是天作之合。川师美术学院人才和学术力量雄厚，学校将全力支持省民协和川师美术学院的编纂工作。

蔡光洁表示，此次能与省民协携手推进《中国民间工艺集成》项目深感责任重大。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平台广、资源多，有一大批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才，承担该项目对他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接下来美术学院将统筹安排，落实责任和分工，稳步推进《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四川卷》的编纂工作。

（文章转自公众号：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旗袍文化沈阳故宫留魅影

5月24日下午，在沈阳故宫大政殿前，第九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刘兰芳宣布首届中国旗袍文化节暨“盛京1636”第三届沈阳国际旗袍文化节开幕。

本次活动由中国民协、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辽宁省民协、中国起源地文化研究中心、沈阳市文联等单位承办。第九届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名誉主席刘兰芳，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福海，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邱运华，中国民协顾问、吉林省文联副主席、民俗学家曹保明，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中国文联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麻振山，中国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主任徐岫鹃、副主任刘德伟等出席了开幕式。

邱运华在致辞中说：“旗袍被誉为中国女性国服，方寸之间，包罗万象，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审美风范。作为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东方女性美的传统服饰，旗袍拥有着丰厚的历史承载与文化内涵，它的演变进程，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史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刻，为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首届中国旗袍文化节隆重召开，将视角投向一个个平凡的旗袍文化爱好者、新时代的歌颂者和大国工匠精神的传承者，这不仅是一次旗袍的盛典，更是向全社会推广中国旗袍文化、宣传中华美学精神、传承中华美学趣味的良好契机。”

开幕演出分为“旗袍之恋”“岁月之华”“霓裳之美”等篇章，以诗词、歌舞、服装表演等多种方式展现旗袍之美。开场部分以二十四节令鼓为主要表现形式，内容以中国传

统二十四节令为创意，用鼓乐抒发节庆的声音、传统的脉搏、文化的呼唤。在活动的最后，与会嘉宾代表用结盘扣连文脉的方式为文化节启幕。

本次旗袍文化节历时一周，将举办盛京满绣、纸上刀绘、中国旗袍起源地文化展、旗袍文化创育论坛、旗袍设计师研讨会、旗袍精品展贸会、旗袍主题摄影展、最美绣娘评选、百家媒体聚焦沈阳、旗袍文化歌词诗歌作品征集等三十余项活动，为大家展现全方位、立体化、多样性的中国旗袍文化内涵，让大家进一步体悟到中国旗袍服饰的无穷魅力，感受到中国旗袍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增强中国旗袍继续向前发展的坚定信念。

大美盛京，旗袍流韵。“旗袍故都”将用一场盛大的旗袍展示秀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将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风采展现给世人。

（史月妹）

《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立说铸魂

5月29日，《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出版工作会议在集团出版艺术馆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潘鲁生，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邱运华，青岛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为达，党委委员、董事李茗茗，青岛出版社副总编辑刘咏等出席。

座谈中，潘鲁生指出，《民间工艺集成》自2016年8月启动，已近三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今年，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套大书的推出，既是对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切实贯彻，也是对国庆70周年的重要献礼。填补了我国历史上“十大集成”没有出版的民间工艺题材的重要空白。《民间工艺集成》的出版对文献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具有重大意义。

邱运华对《民间工艺集成》项目目前工作要点进行了说明，认为第一批5省示范卷尽快交稿将会对其他省卷起到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他要求编辑组督促各省卷严格按照

《编纂工作手册》体例执行；强调了图片的重要性，要求把好图片质量关。

王为达在谈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求“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民间工艺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传承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人的智慧、文化精神和文化自信的反映，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中国民协与青岛出版集团有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合作出版《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等多个国家级项目，取得优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感谢中国民协对青岛出版集团的信任，把《民间工艺集成》这样一个重要的项目托付集团。王为达表示要从编辑力量、资源配备等各方面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到位。他要求编辑人员严格把好图书质量关，切实推动出版工作进行顺利，同时就图书设计方案与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民间工艺集成》编委、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民艺研究所副主任付德雷向与会领导汇报组稿进度、体例修改及执行情况。青岛出版社艺术出版部主任、编委申尧汇报《民间工艺集成》编辑队伍建设、内容质量标准的执行情况、装帧设计方案等工作情况。

《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共 34 卷。2016 年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018 年入选“十三五”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规划（十四项）之一。《民间工艺集成》计划 2020 年 12 月前出版。本书由清华大学视觉传达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楠先生担任总设计师。

（中国民协供稿）

· 国际信息 ·

◆ “中国史诗传统展”首秀哈萨克斯坦

5 月 16 日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中午，“中国史诗传统展”在阿拉木图市阿里一法拉比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图书馆举办。本次展览主要基于两个目标。一方面展示中国史诗传统的基本面貌，介绍史诗的类型与流布、史诗演述人与史诗代际传承、史诗演述与民俗生活、史诗文本与文化表达形式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回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中国少数民族口头史诗传统领域的建档历程和多重实践，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

来自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的师生约 350 人参加了开幕式，16 日当天参观展览人数超过 800 人，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美国、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印度、意大利、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国际留学生。

此次展览用 40 块展板，容纳了近百张图片和一万多词的英文介绍，内容涉及中国 20 多个民族 60 多种史诗传统。展览还专门设立了哈萨克族史诗专版，介绍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史诗传承情况。

据悉，此次展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合作筹建“中国研究中心”的学术交流活动之一。展览将在该校图书馆、东方学系、学生服务中心等多个场馆巡回展出。参观“中国史诗传统展”也将作为该校各国学生的夏令营活动之一。展览期间，中哈双方代表还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选址、学术交流和研究计划进行了磋商。学者们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史诗蕴藏丰富、型类多样、分布广阔、源远流长，分别形成了“北方英雄史诗带”和“南方民族史诗群”。特别是藏蒙史诗“格萨(斯)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以及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三大史诗”。其中《玛纳斯》在哈萨克斯坦也有流传。而《阿勒帕米斯》《阔布兰德》《英雄阿尔卡勒克》等史诗传统更是中国哈萨克族和哈萨克斯坦人民共享的人类文化遗产。这些世代相续的口传史诗，反映了各民族的精神世界及其卓尔不群的诗性智慧，在塑造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势学科“中国史诗学”课题组为此次展览提供了内容支持。

据介绍，“中国史诗传统展”是全球巡展，哈萨克斯坦是首站，未来该展览将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中国研究中心的建立到其他国家展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辑录：陈婷婷)

◆ 中国技艺闪耀伦敦手工艺周

2019 伦敦手工艺周“技艺中国”展 10 日晚在英国伦敦友好俱乐部举办。这一汇集中国当代手工艺精品的展览，让观众零距离感受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中国手工艺。本次展

览是展示中国传统工艺振兴成果的窗口，是体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项目，也是增进中英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这是“技艺中国”展第2次亮相伦敦手工艺周，被纳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也是“中国旅游文化周”活动之一。本次“技艺中国”展以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为主线，展示了来自中国10个省（区、市）的逾40位国家级或省级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青年设计师的优秀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旨在展示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展现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与应用，促进中国传统手工艺传承人与国际优质创意设计资源的对接交流。

展览作品分为霓裳羽衣、鼓瑟生香、东风西韵、百盏千杯等7个单元，集中展现苏绣、水族马尾绣等近2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及金银掐丝、珐琅工艺等逾10种传统手工技艺。

“技艺中国”展期间，将举办中国活字印刷、泥塑彩绘技艺体验工作坊、手绘旗袍课堂、手工技艺国际大师班等互动交流活动。

该活动是中国驻英大使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和“中国旅游文化周”活动之一。伦敦手工艺周由英国王储查尔斯发起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是重要的国际性文化活动。

（来源：<https://www.shine.cn/news/nation/1905114489/>，翻译：陈婷婷）

◆ 欧洲遗产保护注入新生力量

5月20日至24日，欧洲青年遗产专家论坛在克罗地亚扎达尔举行。来自欧洲各国的28位青年遗产专家参加了论坛。

青年遗产专家论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教育项目（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Programme）的一部分。为纪念2018欧洲文化遗产年（European Year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8），UNESCO联合欧盟（EU）共同制定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旨在加强文化遗产、青年和教育之间的联系。该项目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

是旨在赋予新一代遗产专业人员以权利，二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内容纳入课堂。

一方面，UNESCO 于 5 月在克罗地亚的扎达尔举办青年遗产专家论坛（Young Heritage Experts Forum），该论坛汇集了来自欧盟的 28 名年轻专家，共同参与一系列与保护文化遗产有关的活动。论坛通过研讨会、小组讨论、实践经验分享和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促进参与者相互学习，为其创造协同效应，使他们成为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倡导者，促进他们在本国实施有关遗产保护的可持续项目。

另一方面，UNESCO 与其联系的学校网络（UNESCO Associated Schools Network）及欧洲各地的教师开展合作，促进学校开展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工作。具体而言，UNESCO 将帮助学校完善或设计创新的教学方法，以促使其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内容纳入教学；为教师和学校制定新的指导性材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核心课程科目（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的课程计划中。

（来源：<http://whc.unesco.org/en/news/1972>，翻译：陈婷婷）